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皮錫瑞 儒學論集

皮錫瑞 著
潘斌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皮錫瑞 儒學論集

皮錫瑞 著
潘斌 選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何 靜
責任校對：高慶梅
封面設計：墨創文化
責任印制：李 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皮錫瑞儒學論集 / 潘斌選編.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4

(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

ISBN 978-7-5614-4797-0

I. ①皮… II. ①潘…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55818 號

書名 皮錫瑞儒學論集

著	者	皮錫瑞
選	編	潘 斌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4797-0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	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張	24.25
字	數	49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 001~1 500 冊
定	價	76.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 ◆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電話：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 ◆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 ◆ 網址：www.scupress.com.cn

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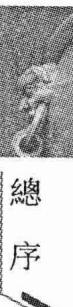
編委會

一

儒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孕育於古老的中國文化，也深刻地影響和作用於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和社會。

春秋末期，孔子創立私學，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形成“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漢書·藝文志》）的儒家學派，開啟了古代中國學術文化的“軸心時代”。儒家創立伊始，即具有以六經為代表的文獻體系，以“仁義”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以“順陰陽、明教化”為功能的價值體系，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正宗的信仰體系和以孔子為祖師的學派特徵。一句話，儒學一開始便具有豐富的學術內涵和明顯的治世功能。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以布衣之身而有非凡之思，他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六經”，託茲舊籍，寓以“仁義”、“誠信”、“中庸”、“忠恕”之精神，創立儒家系統理論，為人楷模，垂教萬世。從此之後，經過孔子整理刪訂的中國上古典籍，就成為儒家淑世濟人的經典教材。六經（後世演繹為十三經）既是儒家覺世牖民的教典，也是歷代學人闡發儒家思想、寄託慧心玄思的安身立命的經本。歷代學人的智慧結晶和辛勤著述，構成了數以萬計的以十三經為主體的儒學文獻體系。以孔子刪訂六經為標誌，中國前此兩千五百年的上古歷史得以講明，後此兩千五百年中華民族的智慧得以啟迪。六經是上下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橋梁與指南，也是認識、研究中國上古、中古和近古歷史文化所必不可少的讀本和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六經就無法講解中國的古代歷史，離開孔子就無法





認識中國的古代社會。

戰國時期，孟、荀繼起，“學”、“思”二派，角力爭先，或暢言“仁義”，或肆談“禮樂”，儒學思想體系和理論構建漸趨完備，於是儒學成為領先諸子而又啟迪諸子的一代“顯學”。繼而秦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儒學遭遇禁錮，儒生備受打擊。漢初布衣將相，厚重少文，崇尚“黃老”，實行“無為”，儒學於是一度消沉。至董仲舒、公孫弘出，儒學包容諸子而又取代諸子，頓顯其治國安邦、訓世覺民之新姿態。漢武帝推行積極有為的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學遂成為當世“國教”，儒家“忠孝”、“禮義”、“仁民”、“愛物”等理念逐漸滲入政治、經濟等民生領域，發揮其端正民心、諷喻世教的作用。自此之後，兩千餘年，後儒沿波，各呈意態，直至晚清，儒家思想一直是指導古代中國學術文化和思想倫理的指南北斗。儒家學說作為中華學術的主流和正宗，也一直是中國古代教育和科舉選士的主體內容。從中央的太學（或國學），到地方學府（府學、州學、縣學）和民間書院，儒家經典及其思想都得到了認真傳授和大力闡揚。誦習儒家經典，踐履儒家倫理，提倡忠孝仁義，服膺《詩》、《書》、《禮》、《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追求君子人格，實現信義和平就成了歷代有識之士矢志追求的理想人生，也為民衆樹立了判斷是非的千古不易的準繩。

一部中國歷史，既是儒學不斷影響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歷史，也是儒學在這一歷程中接受各種文化回饋、應對各種需求（甚至挑戰），不斷發展壯大自己的歷史。歷代統治者，無論是出於維繫萬世基業的需要，或是出於治世牧民的考慮，大多繼承和發展了自西漢以來形成的以太學（或國學）、郡國府州縣學傳播儒學，以察舉或科舉選拔人才的制度。並對儒經的闡釋、儒學理論的發展、儒家學說的實踐，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貫徹，傾注心力，提供條件，形成了風格獨特、千古一系的以儒學文獻、儒家經學、儒家學術、儒學思想、儒學文化、儒學倫理等為內容的有機學術體系，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和中堅。儒學在教育士子、鑄造民族性格、豐富祖國文化、形成中國特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儒學，既是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統思想和實踐倫理，也是自身具有系統理論、豐富內涵和博大文獻的經典之學、系統之學。它既是治術和學術，也是政典和教典；既是中國人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國人的主體思維。它與佛、道二教以及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一道，構成了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自兩漢以迄晚清，概莫能外。回顧歷史，服務未來，作為中華胄裔的當代學人，又焉能妄自菲薄，數典忘祖！

二

歷史降至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儒學一花獨盛的歷史瞬間成為明日黃花。列強進逼，“西學”東漸，中華民族信守了兩千餘年的核心價值觀念搖搖欲墜，

中華民族固有的精神家園也隨之分崩離析。孔廟被拆，書院轉制，尤其是民國初年全盤接受西方教育体制，儒家經學從教學計劃中被刪除，儒家思想在學術領域被批判。從此之後，中國的教育界很難看到儒家經學那熟悉的身影，中國的學術史上也再沒有儒家神聖的地位。漸漸地，也是令人痛心地，中國儒學被醜化，被虛化，被肢解，甚至被遺忘。更有甚者，儒家經典被指為偽書，儒學文獻被誣為垃圾，儒學倫理被拋諸腦後，儒家學說被掃地出門，實為空前所罕見、亘古之未有！中國儒學在自己的國度裏頓時成為游魂野鬼，了無“血食”、“寄身”之所！現行的所有學科設置、圖書分類和項目管理體系中都沒有中國儒學的地位！

回顧二十世紀與中國儒學有關的學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五種類型：一是對儒學及其經典持懷疑和反省態度的“疑古派”；二是對儒學及傳統文化抱反對和決絕態度的“反孔派”；三是對儒學抱發展和改造態度的“新儒家”；四是突出儒學的信仰價值，必欲變儒學為宗教的“孔教派”；五是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純學術研究的“研孔派”。

“疑古派”和“反孔派”在二十世紀初期曾經是中國學術的主流，至六七十年代“文革”時達於高潮。他們非毀詩書、鄙視仁義、拋棄禮樂、懷疑經典、批判聖賢、叛離傳統，視儒學為一切腐朽落後的總代表，恨不得將儒家經典“拉雜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在對待“中國儒學”學科建設和學術傳承與發展等方面，自然不感興趣。他們之中雖然不乏“著作等身”之人，但從建設角度看，卻是“風疾馬良，去道益遠”，南轅北轍，乏善可陳。

出於對疑古、反孔的反動，“新儒家”運用近代西方思想學術來更新儒理、發展儒學，必欲使儒學適應並服務於當代和未來社會，此亦古來儒學發展未有之新境界，從而促進了儒學學理的自身建設。“孔教派”從宗教的角度審視和發展儒學，他們借鑒西方宗教理念，必欲將儒家發展成儒教（或孔教），對加強儒學信仰、完整保存儒學自身體系有所助益。“研孔派”則從純學術史角度，對儒學及其經典進行研究和考述，對認識儒學的本來面目、歷史狀況大有裨益，客觀上為恢復“中國儒學”的完整性提供了幫助。下面即簡述後三派的主要活動。

二十世紀初期，劇烈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儒學遭受空前大難，雄峙東方兩千餘年的儒學大廈轟然坍塌，儒學統治中國的時代遽然終結，嚴格意義上“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的傳統儒家已經不復存在。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聲浪中，梁漱溟等人挺身而出，為孔子辯護，揭起儒學復興的旗幟，成為“現代新儒家”的前驅。隨後，經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勸以及馮友蘭、賀麟等學人的不懈努力，“現代新儒學”發展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思潮之一，在學理上帶來了儒學的革新，形成“新理學”、“新氣學”、“新心學”、“新實學”等新儒家學派，大大提升了民族自信心，為當時的民族自強以及隨之而起的抗日救亡運動注入了新鮮空氣與活力。



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現代新儒學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去市場，於是轉移至中國香港、臺灣地區延續其生命，主要代表人物有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方東美等。他們以接續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有感於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他們深情地呼籲：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應該完好地保留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和國民精神。他們著書立說，四處講學，身體力行，宣傳儒理，在世界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最具影響的活動是共同簽署和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書》，即“中國文化宣言”。

七八十年代，是現代新儒學的復興期。從1980年起，後現代主義思潮流行，認為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實用主義等片面強調工具理性，忽視價值理性和對人的終極關懷，有損於人類幸福和長久和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以來，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儒家資本主義”概念的流行。中國大陸蠻橫無理的“批孔”“批儒”引起的逆反心理，使得大陸部分學人與香港、臺灣地區現代新儒家聲氣相通，從而推動現代新儒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不管其政治主張如何，現代新儒家積極謀求儒學現代更新，主張中華文化的自我本位，喚醒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同時也為儒學現代更新和發展作出了積極思考，這無異於使儒學這棵千年古樹催生出無數新枝嫩芽，展現出無限生機和光明前景。

“孔教派”從觀念上講，往前可以追述到明末西方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後引起的中西文化和信仰之爭，而“孔教”一詞的正式提出則始於二十世紀初廖季平、康有為、陳漢章等人。廖氏出於對孔子的尊大，正式發表《孔教哲學發微》，提出以孔教統天下一切學術；康氏則有感於維新變法失敗、西學大量東漸，以為是中國缺乏宗教信仰所致，於是發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認為定孔教為國教，使“人心有歸，風俗有嚮，道德有定，教化有準，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其弟子陳漢章等人起而和之，成立孔教學會和孔教學院，於是“孔教”形成一時熱門話題。至八十年代，任繼愈先生再提儒教問題，其弟子李申更撰著《中國儒教史》、《儒學與儒教》、《中國儒教論》等系列專著，將這一討論推向深入。這一問題在海外也有激烈的爭論，至今方興未艾，其觀點也是多種多樣、五花八門。他們認為，儒學具有宗教性，具有超越性和終極性，也具有其他宗教性因素，在中國歷史上起到過宗教的作用。也有人認為儒教與其他宗教不同，它只是道德教、人文教，肯定儒學仍然有現代意義。當然，也有人認為儒學是封建社會的宗教，已經成了博物館的歷史收藏物，從而否定儒學仍然具有現代意義。

“研孔派”則多半是在儒學信仰得不到滿足情況下的轉型，章太炎曾論清學曰：“多忌，故歌詩文史楷；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研孔派”的作為正與之相似，不過

不是“說經”，而是“說史”了。這一派中，老一代學人如蒙文通、白壽彝、金景芳、張岱年等先生，大多走過“由經學而史學”的道路，他們早年在儒家經學、孔學、易學以及宋明理學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隨着經學學科退出歷史舞臺以及近代教育的轉型，這批學植深厚的專家學人，不得不將精力轉入純歷史的或儒學史、經學史的研究，角色也從當初的信孔、尊孔轉為研孔，即使是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也不忘為孔子和儒學說幾句公道話。改革開放後，從1979年始，在中國大陸逐漸形成研孔熱潮。1985年在中華孔子研究所（中華孔子學會的前身）成立會上，張岱年慎重宣佈：“盲目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盲目批孔的時代也過去了，現在應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研究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此後研孔文章日益湧現，研究專著越來越多，特別是具有革命家、教育家雙重身份的匡亞明先生出版了《孔子評傳》，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嚴密的邏輯、新穎的見識、深刻的分析，塑造了孔子這位品德高尚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形象，實開啟正面研究儒學之先聲。此後同類的著作有：綜合性的如趙吉惠等《中國儒學史》、《中國儒學辭典》，劉蔚華等《中國儒學思想史》，龐樸主編《中國儒學》等；專題專經性研究，則有金景芳《學易四種》、《孔子新傳》（合著），劉起釪《尚書學史》，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等，對儒家經學及其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和總結。

特別是二十世紀後期，一批年青學人登上學術舞臺，在專門學術史研究方面做出可喜的成績，出版了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廖名春、梁章弦、康學偉《周易研究史》，洪湛侯《詩經學史》，趙伯雄《春秋學史》，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姜林祥、王鈞林等多卷本《中國儒學史》，等等。真是後來居上，異軍突起，斐然可觀。這些著作既是對儒家學術史的研究，也是對儒學學科整體形態的呈現，為儒學學科的恢復提供了歷史的和學術的支撐，為儒學研究“春天”的到來廓清了迷霧。

三

放眼當今的學術界，中國儒學的命運已經有了很大改觀，一場“文化復興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開展，風雲際會，中國儒學學科建設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我們高興地看到，先是由民間自發組織，後是由政府主辦的“祭孔大典”越來越隆重，由國家出資興辦的“孔子學院”遍佈五洲四海，國內一些高等院校（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也紛紛成立儒學院（或國學院），一些有條件的高校還設立“中國儒學”博士點，正式公開招收儒學專業和以儒學為教學內容的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儒學這門古老而又日新的思想學術再度步入淑世濟人的大學校園，儒學研究、儒學教育以及儒學學科建設的問題再次被提到中華學人的關注視野和有關管理部門的議事日程。



1997年四川大學啟動《儒藏》編纂工程，在儒學文獻系統整理和獨立體系構建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四川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為適應儒學人才培養的需要，還籌劃和組織了“儒學教材”的編纂，一套全面反映儒家經典、儒學歷史、儒學思想、儒學文獻、儒學文化以及儒學文選的系列教材正在醞釀之中。它們的編成和出版，必將對儒學的復興和再度興盛起到積極的作用。

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博士曾經預言：“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倒回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既然人類有此需求，儒學在二十一世紀也就有了復興的理由和希望。儒學學科的回歸和重振，應該指日可待，為期不遠矣！套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儒學復興“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儒學具有合乎人性、潤乎人心的系統理論，其追求社會和諧、實現世界和平的理想，無疑具有超乎國家和種族的普世價值，特別是儒學自身具有兩千五百年的發展歷史，我們對儒學的再度復興沒有理由不抱樂觀的態度。

當然，這種可能也正如當年毛澤東同志所說只是“快要”而已，其間還有很長的路需要我們去走，包括對儒學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回顧和研究，對儒學成果進行完整的收集和整理，對儒學學科體系進行全新的重組和構建，等等。我們正在從事的《儒藏》編纂和研究事業，正是一部收集和整理儒學發展歷史和學術成果的大型叢書，它收錄了上自先秦、下至清末的儒學成果和史料，可為儒學的當代復興和發展提供最齊全的資料。

如果說《儒藏》反映的還是儒學古代成就的話，那麼這套“二十世紀儒學大師文庫”則是《儒藏》的續編，它是一部收集和整理近代、現代儒學研究成果的資料寶藏。其作者包括部分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的人，也有個別作者跨入了二十一世紀，但其成果主要發表在二十世紀之中。本文庫所收錄的基本上是二十世紀的成果，上可與《儒藏》相銜接，下可啟二十一世紀儒學發展之新知。它是承上啟下的橋梁，也是溫故知新的土壤。

二十世紀，風起雲湧，世事變遷，靡有常態。大致說來，前半葉天造草昧，雲雷混沌，由於世勢日非，國是莫定，文化陵夷，儒學自然不振；後半葉處於新舊體制交替之中，缺乏經驗，文化重建創新不足，優秀傳統繼承不夠。整個二十世紀，除了改革開放後二十年儒學稍有重振氣象外，儒家與經學，不是被打倒和誣謗，就是被忽略和荒廢。幸而尚有一批有學識、有良知的老前輩，仍然不離不棄，無怨無悔，耕耘不輟，猶如萬綠叢中的一點丹紅，使傳統儒學領域尚存幾許生機，不致一片荒蕪。這是中國文化之幸，中國歷史之幸，也是後學晚生綿綿瓜瓞、薪火傳承之大幸！收集整理、總結研究這些成果，回想這些碩學大師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仍然堅守儒學的精神家園，其成果可資借鑒，其精神更是令人欽佩！後之繼起者，當以此為階梯奮力前行！

序

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一字麓雲，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學者稱“師伏先生”。其父皮鶴泉為舉人，曾任浙江宣平、松陽縣知縣，對儒學崇尚有加。皮錫瑞幼承家訓，六歲開始讀書，十二歲補縣學生員。清光緒八年（1882），赴順天鄉試中舉人，與余堯衡、文廷式、陳三立為同科。後多次參加會試皆落第，於是潛心著書講學。

光緒十六年（1890），皮錫瑞主湖南桂陽州（今桂陽縣）、龍潭（今溆浦縣）書院講席。兩年後，應江西學使龍湛霖之邀，移江西南昌經訓書院達七年之久。任教期間，對諸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誘，主張解經詞章必宗家法，數年間書院有數十人舉於鄉試。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憤於喪權辱國之《馬關條約》，皮錫瑞極言變法不可緩。湖南的維新運動蓬勃興起後，他應熊希齡之邀任南學會學長，主講學術。他從孔教中引申出變法之說，根據歷史事實駁斥頑固派的守舊主張，深受聽眾歡迎。戊戌變法失敗的次年，皮錫瑞被驅逐回籍，並革除科名，三年以後才得開復。

返湘後，皮錫瑞先後任湖南高等師範館、中路師範、長沙府中學堂講席，學務公所圖書課長及長沙定王臺圖書館纂修等職，並以主要精力從事著述。光緒三十四年（1908），皮錫瑞病逝於長沙。

皮錫瑞學識淵博，精研覃思，著作甚多。青年時代篤志於詩文，著有《師伏堂駢文》、《師伏堂詩草》。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皮錫瑞的最大成就當在經學領域。他博通羣經，著書立說，是晚清不可多見的經學大家。據筆者初步考察，他的治經特點和經學成就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皮錫瑞經學著述宏富，治經範圍廣。其《尚書》學方面的著述尤多，如有《尚書大傳疏證》、《尚書古文疏正辨證》、《史記引尚書考》、《尚書古文冤詞平議》、《尚書古文考實》、《今文尚書疏證》、《尚書中候疏證》。其《今文尚書疏證》被王先謙稱為“條理今文，詳密精審，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弊，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為前導，可不迷於所往”。可謂近代今文經學的力作。《王制箋》、《孝經鄭注疏》、《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聖證論補評》等亦頗精審。其《經學通論》，於《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三傳的認識皆頗有見地，啟發後學，至今仍為人們研治經學首選的入門之書。

第二，皮錫瑞重西漢今文經學家的治經路數。

首先，他推崇西漢今文經學家重師法、明微言大義的治經路徑。他說：“孔子道在六經，本以垂教萬世；惟漢專崇經術，猶能實行孔教。雖《春秋》太平之義，《禮運》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後政教之盛，風化之美，無有如兩漢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經學歷史·經學極盛時代》）皮氏此處所云“漢”，當指西漢今文經學。又云：“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當時之書，惜多散失。傳於今者，惟伏生《尚書大傳》，多存古禮，與《王制》相出入，解《書》義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發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於天人性命之學；韓《詩》僅存《外傳》，推演詩人之旨，足以證明古義。學者先讀三書，深思其旨，乃知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之學，如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皮氏褒獎西漢今文經學，他認為西漢今文經學之長在於明微言大義，而非只事章句訓詁。他尤為推崇西漢武、宣之間的經學，以為此時經學恪守家法，純正不雜。

其次，皮錫瑞推崇西漢今文經學治經守專門之學。他說：“今之治經者，欲求簡易，惟有人治一經，經主一家；其餘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經，更可從緩。……此古之治經者所以重家法而貴顛門也。國朝諸儒有承家法而守顛門者，亦有無家法而非顛門者；今主一家，當取其有家法與顛門者主之。”（《經學歷史·經學復盛時代》）皮氏推崇“人治一經，經主一家”的經學路數。對於治經的清代學者，他更推崇的是那些有家法而專門者。

再次，皮錫瑞對讖緯之學有着同情的理解。漢代讖緯風行，今文經學家治經，多於讖緯有關涉，如董子《春秋繁露》多有陰陽五行思想，孟喜治《易》主卦氣，京房治《易》主術數占驗等。後世經學家治經，推崇今文經學者當難避開讖緯談經學，皮氏即是如此。他說：“讖緯多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亦非巨謬。”《經學歷史·經學統一時代》又說：“圖讖本方士之書，與經義不相涉。漢儒增益祕緯，乃以讖文牽合經義。其合於經義者近純，其涉於讖文者多駭。故緯，純駭互見，未可一概訾之。其中多漢儒說經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緯》，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書緯》，夏以十三月為正云云出《樂緯》。後世解經，不能不引。三綱大義，名教所尊，而經無明文，出《禮緯·含文嘉》。馬融注《論語》引之，朱子《注》亦引之，豈得謂緯書皆邪說乎？”（《經學歷史·經學極盛時代》）

第三，皮錫瑞治經雖主今文學，但對古文說亦有採納，持論較為平允。如

皮氏在治《尚書》時曾云：“今文有僞俗，不妨以古文參考。”（《今文尚書考證》）他認為今文之說並非盡善盡美，當今文之說不能作為依據時，可參考古文之說。

皮錫瑞繼承了古文經師注重名物訓詁的治經傳統。如他在訓釋《尚書·皋陶謨》“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時云：“《釋名·釋樂器》：鞶，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柷，狀如伏虎，如見柷柷然也，故訓為始以作樂。”（《今文尚書考證》）此處訓解“鼗鼓”、“柷敔”徵引《釋名》，此乃古文家慣用之治經方法。在皮氏經說文字中，考證名物禮制的內容不在少數，且考證精詳，頗有參考價值。

對於東漢末年融會今古文且精通三禮的鄭玄，皮錫瑞表示推崇。皮氏陸續寫出了《鄭志疏證》、《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等書，表彰鄭學。他認為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經學通論·三禮》）他認為鄭玄融會今古文是通博的表現。

皮錫瑞經學著述甚豐，然而只有《經學歷史》有中華書局的標點本，這顯然不方便學者對皮錫瑞經學的研究。為此，我們收集皮氏的經學論文並作了標點，同時還校勘了著作中使用的史料，訂正了原文中明顯的譌誤，成《皮錫瑞經學論集》一書。此書所收皮氏經學論文，主要采自《師伏堂叢書》。書後的《年譜》，是其孫皮名振撰寫的《皮鹿門年譜》的節略本。《經學家法講義》為湖南大學吳仰湘先生校點，在此對吳先生惠賜稿件表示感謝。此外，四川省委黨校邱進之先生校閱了全稿，金生楊、李冬梅、王小紅、張尚英四位博士和霞紹輝碩士幫助校閱了部分稿件，四川大學出版社何靜女士也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並表示謝意。

對於皮錫瑞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吳仰湘先生的《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已有較全面的探討；但是，學術界對於皮氏經學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研究論文寥寥。希望這本整理之作的出版，能為學人們開展皮錫瑞經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方便。

潘斌

2009年9月25日於成都

序

目 錄

經學歷史	(1)
一、經學開闢時代	(1)
二、經學流傳時代	(5)
三、經學昌明時代	(8)
四、經學極盛時代	(13)
五、經學中衰時代	(18)
六、經學分立時代	(22)
七、經學統一時代	(25)
八、經學變古時代	(29)
九、經學積衰時代	(33)
十、經學復盛時代	(35)
經學通論	(40)
自序	(40)
易經	(42)
尚書	(73)
詩經	(113)
三禮	(161)
春秋	(221)
經學家法講義	(285)
一	(285)
二	(286)
三	(287)
四	(288)
五	(289)
六	(292)
七	(293)
八	(294)
九	(294)

目
錄



十	(295)
十一	(297)
十二	(297)
十三	(298)
十四	(298)
十五	(298)
十六	(299)
十七	(300)
十八	(301)
十九	(302)
二十	(303)
序 跋	(305)
《尚書大傳疏證》自序	(305)
《尚書中候疏證》自序	(306)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自序	(307)
《孝經鄭注疏》自序	(308)
《鄭志疏證》自序	(308)
《聖證論補評》自序	(310)
《六藝論疏證》自序	(311)
《王制箋》自序	(311)
《王制箋》後序	(312)
《漢碑引經考》自序	(314)
《魯禮禘祫義疏證》自序	(315)
《史記引尚書考》自序	(316)
《史通·申左篇》書後	(317)
《史通·惑經篇》書後	(318)
《駁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319)
《〈發墨守〉〈箴膏肓〉〈釋廢疾〉疏證》自序	(320)
《兩漢詠史》自序	(321)
《四川易古田先生遺說》序	(322)
《今文尚書考證》凡例	(322)
皮鹿門年譜	(327)
皮鹿門先生傳略	(327)
皮鹿門年譜	(328)
皮錫瑞著述總目	(369)

經學歷史

一、經學開闢時代

凡學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以獲從人之途。古來國運有盛衰，經學亦有盛衰；國統有分合，經學亦有分合。歷史具在，可明徵也。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爲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史遷、揚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辭。亦如《連山》、《歸藏》止爲卜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爲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爲經矣。《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檮杌》止爲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爲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爲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爲法戒。《周禮》出山巖屋壁，漢人以爲瀆亂不驗，又以爲六國時人作，未必真出周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爲三百篇，刪《書》爲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史記·周本紀》不言文王作卦辭，《魯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辭，則卦辭、爻辭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闡發羲、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爲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爲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爲記事之書。此二經爲孔子所作，義尤顯著。漢初舊說，分明不誤；東漢以後，始疑所不當疑。疑《易》有“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謂重卦當在神農前；疑《易》有“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謂卦爻辭爲文王作；疑爻辭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於岐山”，謂非文王所作，而當分屬周公。於是《周易》一經不得爲孔子作；孔《疏》乃謂文王、周公所作爲經，孔子所作爲傳矣。疑《左氏傳》韓宣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謂周公作《春秋》。於是《春秋》一經不得爲孔子作；杜預乃謂周公所作爲舊例，孔子所



修爲新例矣。或又疑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周禮》、《儀禮》並出周公，則孔子並未作一書；章學誠乃謂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世。其微言大義實可爲萬世之準則。後之爲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後之爲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內。故孔子爲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惟漢人知孔子維世立教之義，故謂孔子爲漢定道，爲漢制作。當時儒者尊信六經之學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爲弘亮洪業、讚揚迪哲之用。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上。雖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未能盡行孔教，而通經致用，人才已爲後世之所莫逮。蓋孔子之以六經教萬世者，稍用其學，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漢以後，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虛名，不知其所以教萬世者安在；其崇經學，亦視爲故事，不實行其學以治世。特以歷代相承，莫之敢廢而已。由是古義茫昧，聖學榛蕪。孔子所作之《易》，以爲止有《十翼》；則孔子於《易》，不過爲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陳搏又雜以道家之圖書，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於孔子之上，而《易》義大亂矣。孔子所定之《詩》、《書》，以爲並無義例；則孔子於《詩》、《書》，不過如昭明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編輯一過，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詩疑》、《書疑》，恣意刪改，使無完膚，而《詩》、《書》大亂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爲本周公之凡例；則孔子於《春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錄一過，稍有增損。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貶，概以爲闕文疑義；王安石乃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而《春秋》幾廢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始於疑經，漸至非聖。或尊周公以壓孔子，如杜預之說《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壓孔子，如宋人之說《易》是。孔子手定之經，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經爲孔子手定，而屬之他人。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爲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

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說，具見於《左氏內外傳》。《內傳》所載元亨利貞之解，黃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書》數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傳》之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或釋《詩》，或徵禮詳見王應麟《困學紀聞》，非但比漢儒故訓爲古，且出孔子刪訂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盡信。穆姜明隨卦之義，何與《文言》盡符；季札在正樂之前，豈能雅頌得所。《困學紀聞》引“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二條，云：“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左氏》昭十二年。《周禮》外史掌《三墳》、《五典》之書；鄭《注》“楚靈王所謂《三墳》、



《五典》”。據此，則《三墳》、《五典》乃《書》之類。偽孔安國《尚書傳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其解《三墳》、《五典》，本於鄭《注》；《八索》、《九丘》，本於馬融。據其說，則《八索》乃《易》之類。皆無明據，可不深究。今所傳惟《帝典》，伏生傳《尚書》止有《堯典》，而《舜典》即在內；蓋二帝合爲一書，故《大學》稱《帝典》。而宋人僞作《三墳書》。若夫伏羲十言，義著消息；神農並耕，說傳古初。黃帝、顓頊之道，具在丹書；少皞紀官之名，創於白帝。洪荒已遠，文獻無徵；有裨博聞，無關闕旨。惟伏羲十言之教，於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鄭、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說。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修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案應氏之說近是而未盡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見《史記·周本紀》，而不云作卦辭；《魯周公世家》亦無作爻辭事。蓋無文辭，故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卦爻辭，則如後世御纂、欽定之書，必頒學官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春秋》，國史相傳，據事直書，有文無義，故亦不可以教士。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如朱子《綱目》有《發明》、《書法》，亦可以教士矣。觀樂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無作《春秋》凡例之事。《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倡。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漢人以爲《詩》、《書》皆孔子所定，而《易》與《春秋》更無論矣。

孔子出而有經之名。《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然篇名《經解》，而孔子口中無“經”字。《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孔子始明言經。或當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爲經。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經典釋文》：“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三說不